

白话四库全书

子部·商君书

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保华

白话四库全书

出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42532)

印刷:北京市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数:2000 千字

印张:133

版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书号:ISBN7-5385-2025-2/ I · 392

定价:998.00 元

商君书

《商君书》，又叫《商君》、《商子》，是战国时代一部有名的法家理论著作。其作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及其后学。

商鞅（约前 390—前 338），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也称为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于商，号为商君，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后至魏国，认真研究过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商鞅虽有治国奇才，且见知于魏相公叔痤，但因年少位卑，未得当时的魏国君主惠王的重视。这时，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为了使秦国尽快强大起来，发布了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的求贤令。这对怀才不遇的商鞅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西至秦国，因陈说以变法图强为主要内容的“强国之术”，取得了孝公的信任。在商鞅的劝说下，孝公于公元前 359 年计划进行变法，遭到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反对。商鞅凭借其系统的革新理论和雄辩的口才，驳斥了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三年之后，即公元前 356 年，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在秦国正式推行变法。史称商鞅第一次变法。这次变法，主要做了如下的改革：一、颁布法律，制定连座法，实行轻罪重刑的刑罚政策；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四、鼓励小家庭独立，规定一户如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课赋。

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在秦国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特别是在对外战争中不断获胜。公元前 352 年，商鞅因功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公元前 350 年，为了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废除井田制，令民开阡陌；二、普遍推行县制；三、统一度量衡制；四、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使秦国很快成为了富强的封建国家。

商鞅不仅是个精明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个善战的军事家。公元前 340 年，商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孙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商鞅由于这一军功，受封于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虽然已使秦国富强，但因剥夺了贵族的特权，损坏了贵族的各种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太子触犯了法令时，商鞅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等用刑，于是遭到公子虔等的怨恨。公元前 338 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秦惠王对商鞅颇多猜忌，公子虔等乘机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迫出走，欲投奔魏国，魏不许入境。商鞅遂回封邑，举兵抵抗，结果战败，被车裂而死。

商鞅虽遭车裂，他制定的新法在秦国却沿用未改，他的政治理想和计划不但没有“人亡政废”，反而根深蒂固地成为了秦国的政治传统。据一些现代学者的研究，商鞅的学说在秦国不断有人传习，并形成了一个学派，对秦国的国策具有影响。流传至今的《商君书》，就是商鞅及其学派的著述汇编。

《商君书》，今本共二十六篇，有题无文者二篇，实存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长短不一，所论述的问题有时互有重复，看来不是商鞅预先有计划撰述的一部论著，而是由一批长短不一、来源

不同的文章及资料汇聚而成的集子。据今人陈天启、高亨、郑良树等研究,各篇的写成年代不一,有的是商鞅的亲著,有的则是其后学的著作。大致说来,《更法》、《垦令》、《境内》、《战法》、《立本》、《兵守》等六篇,其形成年代较早,所载多为商鞅的思想,其中《垦令》、《境内》、《战法》、《立本》四篇极可能是商鞅的亲著。《算地》、《农战》、《修权》、《去强》、《徕民》、《弱民》、《说民》、《外内》等八篇的形成年代也较早,大概是由曾亲闻商鞅师教的弟子完成的,其说多与商鞅相合,但《去强》、《说民》主张重刑轻赏,与商鞅的学说已有差别。《靳令》、《壹言》、《开塞》、《错法》、《赏刑》、《画策》、《慎法》等七篇的形成要晚些,其作者大概距离商鞅已较远,所论多与商鞅不同,继续强调重刑轻赏,甚至主张重刑不赏。《君臣》、《禁使》、《定分》等三篇的年代最晚,大概是秦统一六国后的作品。由此看来,今本《商君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既载有商鞅的思想,又载有商鞅后学的思想,是研究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资料宝库。

商鞅作为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既包含了法家的一些基本主张,又根据秦国的具体情况和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

法家都认为治国的目标要固执,而治国的手段要灵活。《更法》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固;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正是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商鞅在秦国大力从事变革传统、更新政治的变法工作。法家都主张,在法律面前不分亲疏贵贱,人人平等。商鞅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这一原则。著名的“太子犯法,黥其师傅”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家都主张,应向人民公布法律,使举国知所依循。商鞅也持有类似的主张,要求政府普及法律条例,使百姓能知法守法。

商鞅到秦国后,根据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当时秦国的迫切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这是商鞅对秦国的重要贡献,也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重要贡献。商鞅的新说主要包括:

一、重视农业。商鞅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农业的好坏决定了国势的强弱。而当时的秦国由于人口稀少,农业不太发达。商鞅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向秦孝公提出了重视农业生产的建议。在《垦令》中,他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二十条措施,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商鞅的重农思想,后来成为了秦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使秦国经济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兼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性是畏罪避利的,所以,只要用重刑及厚赏的办法,就可以使人民驯服而达到国治的结果。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评述商鞅时说,“其诛重而必”,“其赏厚而信”。

三、重视战争。战国时代,列国相争,各国国君都想兼并邻国,扩大地盘,以图统一天下。于是,战争成为了国家政治中的头等大事。商鞅对军事素有研究,并有专门的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兵家类著录的《公孙鞅二十七篇》,就是他所著的兵书。集法家、兵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商鞅,在治国时不但重视法制,也很注重军备。在《商君书》中,商鞅始终强调,政治上进行改革,就是为了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富国强兵,最后要落实到扩张国土上。因此,他极力鼓励军事和军功,制定并推行了按军功授予爵禄的制度。

四、统一民心 and 制度。为了团结全民,集中国力从事耕战,商鞅认为必须以法家的思想统一全民的言行,必须统一国家的各种制度。

商鞅死后,其后学为完成商鞅的未竟之业,在秦国继续宣传法家学说,并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对商鞅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开拓和修正。他们主张提高国君和法律的地位,认为国君要掌握法、信、权,成为国家行政的核心;法律必须经常修改,以适合形势的变化。他们改变了商鞅耕战并重的主张,把战争放到了首位,认为国家强盛必然要发动战争,国家衰弱则更必须发动战争

以转移矛盾。他们特别注重调查和规划国家的资源,为的是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些资源。从有关史料和史实看,商鞅后学的一些主张,似曾在秦国付诸实施,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今本《商君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与别的古书一样,出现了不少错简和讹误。从明代起,开始有学者做文字校刊,清代做校刊的人更多,近人则多用力于文义的注释。他们所取得的成果,都是我们今天研读《商君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今人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高亨的《商君书注译》、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三种,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并有许多新的创见,对阅读《商君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郑良树的《商鞅及其学派》,对商君书各篇的时代和思想做了详细的研究,也是阅读《商君书》的重要参考书籍。

更 法

秦孝公执政期间,凡事关国计民生,总是与公孙鞅、甘龙、杜摯三位大夫一起,坐而论道,各抒己见。他们经常论及的有,如何把握时势的脉搏以及时事的变化;如何寻求到国家政治、法度的根本所在;如何最有效地统治国家役使人民。

孝公提出自己的担忧:“继承先人做了君主,自然不敢忘却国家,这是任何一个国君的正道;建立并完善法度,尽力使君主成其光明、完成使命,是做臣子的本份。如今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变革礼制来教化百姓,但就是担心天下人会批评指责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行动迟疑不决,就难于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君主你赶紧下决心吧,变更法度不应该顾忌别人的非议。况且高出常人的作为,往往要为世俗之人所反对,独具远见的筹略,必然也容易被人民所嘲笑。俗话说:‘愚昧之人在事情已经作完之后还看不清楚;智慧之人在事情尚无萌芽之前就察觉到了。’人民,不可以与他们一起思考事业的开端,只可以与他们分享欢庆成功的喜悦。”郭偃说过:“崇高者往往提出主张时不附和俗子,建大功之人不和群众商议。”法度规则是爱护人民、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礼制是利于国家治理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勇于摒弃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即使不遵守旧礼制也未尝不可。”

孝公信服而称赞道:“好!”

甘龙说:“其实不是这样。我听说过:圣人不轻易变革人民的旧礼俗而施行教化;智者不变更旧法度来治理国家。沿袭人民的旧礼俗来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实现目的。依据旧法度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都很熟悉,人民也习惯成自然。现在,如果要变法,摒弃旧制,变革礼制,恐怕天下人会指责君主的不明,希望您仔细琢磨为是。”

公孙鞅说:“你所说的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分于旧习,书呆子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和知识。平常人和书呆子可以当官守法执法,不能一起研究讨论法制以外的事。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同,但都成了霸业。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智者创造法度,愚者却为法度所制裁;贤者改革礼制,而庸人则受礼制的约束。我们当然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国家大事,不能和受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君主你大可不必顾虑了。”

杜摯说:“我听说,如果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就不如不变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旧礼制。效仿古人可以保证不会出错,遵守旧礼就不会出现奸邪之人。君主你三思而行!”

公孙鞅说:“古代的教化方式各异,我们又效仿哪个古人?帝王不互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人民而不杀人,黄帝、尧、舜等杀人而不叫家人连

坐,到了文王、武王,也是各自结合当时形势,制定相应的法度和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制定,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使用得当才能发挥最大效能。所以我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仿古人。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旧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制。因此,变法者不应排斥,拘守旧法者不应受到重视。君主你无须犹豫!”

孝公说:“非常好!我曾听说过,穷僻的市井里遇事多奇怪;做死学问的学者,对事喜欢空谈辩论。愚昧者所喜欢的事,正是智慧者所悲哀的事;狂妄者所愉快的事,正是贤人所伤心的事。对那些拘泥现状,来议论大事的说法,我不再疑惑了。”于是,孝公颁布了《垦草令》。

垦 令

假如政府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处理政务,不相互推诿,那么,贪官污吏就来不及从老百姓身上谋求私利;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公事也就不至于相互牵扯拖延。只要各级政府部门对公事不相互推诿,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如果贪官污吏来不及从老百姓身上谋求私利,农民的利益就不至于受到损害。只要农民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荒地必然就会被开垦了。

如果政府能够根据老百姓粮食收入的多少来计算应该向老百姓征收土地税收的多少,并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那么,全国的土地税收制度就统一了,老百姓负担的赋税也就公平了。一旦全国的土地税收制度统一了,政府也就有了信用和统一的税收标准。如果政府有了信用和统一的税收标准,各级官员也就不敢从中营私舞弊。如果老百姓负担的赋税比较公平,他们就会比较小心谨慎。如果老百姓能够小心谨慎,他们就会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老百姓既不会指责政府办事不公,也不会怀疑和痛恨各级官吏在工作中贪污舞弊。只要老百姓既不指责政府办事不公,也不痛恨各级官吏,年轻力壮的农民就会愿意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不肯轻易改变职业。如果年富力强的农民能够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龄比较小的农民就必然要向他们学习,而不至于滋生懒惰的习惯。只要年龄较小的农民也向他们学习而不滋生懒惰的习惯,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不给那些靠在各国之间游说而谋求官职的人以爵位和官职,那么,老百姓就不会重视钻研学问的人,也就不会轻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如果老百姓不重视钻研学问的人,自己也就不会去学习这些知识,自然就会变得愚昧。如果老百姓变得很愚昧,也就没有机会去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往。只要老百姓不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就不知道如何反对自己的国家,国家的安全自然就没有危险。只要老百姓不轻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们就会专心致志于农业生产而不会懒惰。既

然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老百姓也能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懒惰,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现在,各地的贵族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在领地内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赋税也很重,在他们的门下,还供养着许多不参加任何劳动却在那里吃闲饭的食客。所有这些,对农业生产都是非常有害的。政府应该按照他们这些贵族家中供养的人口的数量的多少向贵族征收额外的人口税,并增加这些人应该参加徭役的数量以作为惩罚。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些整天不参加劳动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就找不到地方混饭吃。如果他们找不到混饭吃的地方,也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如果连这些人也都参加农业生产了,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政府应该下令不允许商人买粮食,而且也不允许农民卖粮食。如果政府不允许农民卖粮食,那么,即使是懒惰的农民也会去努力耕作,以免没有足够的粮食生活。如果不允许商人买粮食,那么,如果遇到丰年,商人就很难挣到钱,更加没有办法享乐;即使遇到荒年,他们也没有多少利润可图。假如没有多少利润可图的话,商人们就会害怕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如果商人们不愿意再从事这种工作,他们就会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只要懒惰的农民能够努力耕作,并且商人们也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那些荒芜的土地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假如政府下令不允许那些演奏音乐、表演杂技的艺人们到各地去表演,那么,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在休息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如果老百姓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到这些人的表演,精神就不会产生浮荡,如果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看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就能够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如果老百姓能够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精神上又不会产生浮荡,那些荒地也就必然能够更快地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下令不准有钱的人家雇用佣人为自己干活,那么,有钱的大户人家就没有办法雇人来扩建和修缮房屋,这些有钱人家所喜爱的孩子和其他的一些懒惰的人就不得不自己动手劳动,那些指望靠给富人打工来挣钱糊口的人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也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了。只要那些大户人家不想着扩建和修缮房屋,农业生产也就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妨害。如果这些大户人家所喜爱的孩子和那些懒人们也能积极参加劳动,已经开垦出来的田地就不会再次荒芜。只要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妨害,而且那些原本给别人作雇工的人也能够去从事农业生产,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政府应当下令禁止人们开设旅馆,这样的话,那些奸巧、虚伪、内心狡猾的人,那些私自和各级官员以及其他国家来往的人,以及那些用各种手段迷惑老百姓的人就没有办法去远处,那么,那些开设旅馆的人们就挣不到钱,他们就必然只能去务农。如果这些开旅馆的人也只能依靠务农来维持生活的话,荒芜的土地必然就会被开垦出来。

如果政府独占了山岭和河流、湖泊的开发权利,不允许老百姓在那里从事采

矿、打柴、打猎、打鱼的工作,那么,那些厌恶农业生产而又懒惰、贪婪、靠山岭和河流、湖泊谋生的人就没有饭吃。如果这些人没有饭吃,他们就必然会去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的话,荒芜的土地就必然会被开垦了。

如果政府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所征的税,让税额比成本高出十倍,这样一来,卖酒肉的人自然就会减少,那么,老百姓就不可能爱好饮酒作乐,各级官员们也就不至于整天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不务正业。如果从事酒肉买卖的商人少了,国家就不至于浪费许多粮食在这方面。如果老百姓不爱好饮酒作乐,就不至于懒于农业生产。如果官员们不沉湎于花天酒地,国家的正常工作就不至于拖延推诿,政府的一切措施也就不会发生不必要的错误。只要国家不浪费粮食,老百姓们也不懒于农业生产,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加重刑罚,使得一人犯罪,他的亲属等人都要连坐。那么,那些心胸狭隘、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打架滋事;那些性情粗暴的人就不敢随便挑起争端;那些懒惰的人也就不敢再四处游荡;也就不会再有人随意地浪费钱财;那些生性奸巧、满嘴阿谀之词的人和那些存心不良的人也就不敢去欺骗别人了。只要这五种人不再在国家出现,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下令不允许老百姓自由迁徙,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得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的人就没有地方吃饭,将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如果那些心性愚昧但却很贪婪的老百姓能够专心于务农,那么,他们也就能够安静了。只要老百姓安静而愚昧,那么,荒地就必然会被开垦了。

政府应该给贵族大家族中那些没有职业的子弟平均地分配徭役,并且按照花名册来役使他们,并提高解除徭役的条件,同时,还要设立管理徭役的官吏,以提供粮食给那些正在服徭役的人。如果这些人不可能逃避徭役,想要做大官也没有把握,那么,这些子弟就不可能投入到权贵们当中,去做他们的爪牙,因此他们一定会去务农。只要这些人也去务农,荒地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

如果政府不允许各级官员们去追求广博的见闻,不允许他们作无谓的辩论,不允许他们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尤其是不允许他们在各县闲居游逛。这样的话,老百姓就听不到什么奇谈怪论,看不到种种怪异的能力。只要老百姓听不到奇谈,看不到异能,那么,那些聪明的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抛开他的旧业,那些愚昧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获得知识,而且也不喜欢对学问的学习。这样一来,由于他们没有知识,而且不爱好学习,就能够致力于农业生产。只要那些愚昧的农民能够积极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那些聪明的农民也就能够不抛开旧业,荒地必然就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规定军营之中不得有女子参与;并且规定军营之中的商人必须自备铠甲及兵器,要求他们密切注视军队的动向,提前作好参加战争的准备;同时,制定办法,使军营之中不得私运粮食。这样一来,各种奸巧的计谋就没有办法隐藏在军营中了;那些偷军粮的人就没有办法将偷来的军粮卖出去;那些运送军粮的人也没

有办法私自拖延军粮的运送;那些整天浮荡、懒惰的人也没有办法在军营中游逛。如果能够使那些偷军粮的人无法将偷来的军粮卖出,使那些运送军粮的人不敢私自拖延军粮的运送,使那些浮荡、懒惰的人不敢在军营中游逛,那么,农民也就不会心绪浮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枉费,这样一来,荒地也就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全国每一个县的政治制度都是同一个形态,那么,人人都会遵从它,即使是贪婪的官吏也不敢玩弄花样;接替的官吏就更不敢变更已有的制度;由于犯了错误而被废除职务的官吏也就没有办法掩盖他的错误行为。如果官吏有了错误行为却没有办法掩盖,自然就不会再出现贪污舞弊的官吏。如果本意贪婪的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接替他的官吏不敢变更制度,那么,官员的数量就可以减少,老百姓也就不会疲于应付给官吏们的供应。如果官吏们不再贪污舞弊,老百姓就不敢随处游荡。只要老百姓不敢随处游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不至于失败。同时,随着官吏的减少,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也就不会太多。如果老百姓不再疲于应付给官吏们的供应,他们就有了多余的时间。一旦农民有了多余的时间,并且向他们征收的赋税又不多,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不会失败,荒芜的土地必然就会被他们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增加在关口市场中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愿意去做生意,商人也会对自己的职业产生怀疑和消极的情绪。如果农民不愿意做生意,而商人也对自己的职业产生怀疑和消极的思想,那么,荒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政府应该按照商人家中人口数目的多少来分配徭役,让商人家的奴仆也按照花名册去服徭役,那么,农民就会安逸,商人就会变得劳苦了。只要农民生活得很安逸,良田就不会荒芜。如果商人生活劳苦,他就没有余力把那些往来赠送的礼物运到各县去。那么,农民就不至于挨饿,而且不必进行各种各样的表面的应酬。只要农民不会挨饿,又不必进行表面的应酬,他们对政府下达的任务就一定会积极响应,对于他自己的生产也不会荒废,因此,农民的生产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只要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成功,荒芜的土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出来。

政府应该规定,老百姓在给公家送粮的时候,不准雇别人的车,而且不允许在车返回时揽载私人的货物;同时,还要规定,在服役时,老百姓的牛车所载的重量必须和官册所注明的重量相当。这样一来,送粮的车在往返时就会比较迅速,因此这项工作也就不会妨害农业生产了。只要这项工作不会妨害农业生产,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政府如果规定,不允许人们为了要照顾罪人而请求官吏许可他们去给犯人送饭吃,那么,犯人就没了照顾他的人。如果犯人没有了照顾他的人,干了坏事就不免受罪。如果做了坏事的人就免不了遭受痛苦的下场,那么,他们就没有了依靠。如果这些人没有了依靠,其他的老百姓也就不至于受到他们的伤害。只要农民不会受到这些人的伤害,荒芜的土地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农 战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君主能够用来吸引和鼓励老百姓努力工作,以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的,就是让他们获得官职和爵位。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变得越来越兴旺和强大,就必须要有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事能力。但是,现在的老百姓都不是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和参与战争来获得国家的官职和爵位,而是只能凭借巧妙的言谈和一些空虚的理论来获得官职和爵位,这也就是所说的只有那些奸巧的人才能获得官职和爵位的原因。一个国家,假如它的老百姓只有通过花言巧语才能获得官职和爵位,那么,这个国家也必然是虚弱的,必然没有真正的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实力,那它的国土也就必然会被其他的国家侵占。

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教育他的人民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积极地投入战争,以便取得国家给予的官职和爵位,对那些不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不参加战争的人,就不允许他们取得官职和爵位。如果国家不再任用那些只知道哗众取宠的人做官,老百姓就会变得朴实。只要老百姓变得朴实,他们就不会浮荡。如果老百姓看到政府的官职和爵位只给予那些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和战争的人,那么,他们就会专心地从事农业生产、积极地投入战争。只要老百姓能够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和战争,他们就不会变得懒惰、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只要老百姓不懒惰、不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他们的力量自然就多。只要老百姓的力量多了,国家也就会兴旺和强大。但是,现在全国的老百姓都认为:“农业和战争这些辛苦和危险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国家的官职和爵位也是可以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在农业和战争上才干很杰出的人都在考虑改变自己的职业,认为一定要努力去学习《诗》、《书》这样的东西,要努力去和其他国家的人联络,这样做,既可以获得很大的荣誉,又可以得到国家给予的官职和爵位;至于那些在农业和战争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杰出才干的小人物,他们就去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以达到避免参加农业生产和战争的目的。一个国家,有了所有这些,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老百姓平时也受到了这样的教育,这个国家的国土必定会被其他国家侵占。

作为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国库中的粮仓是满的,也不会放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一个老百姓众多的大国,如果能够不被花言巧语所迷惑,那么,老百姓的思想就会朴实而专一。老百姓朴实专一,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用奸巧的手段来取得国家的官职和爵位。只要国家的官职和爵位不会被人用奸巧的手段来获得,奸诈的人也就不会产生了。如果奸诈的小人不能够在国内产生并获得官职和爵位,国君也就不会被他们所迷惑了。

但是现在,国内的老百姓和那些有官职、有爵位的人们,都发现,在政府里可以凭借花巧的言论来获得国家的官职和爵位,因而导致官职和爵位的给予没有一个

明确的标准,因此,官员们在上朝的时候就会想尽办法去曲意逢迎国王的爱好,以便取得更高的官职和爵位,回家后,就一心考虑如何想办法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好处,而不把治理国家、处理公事当作自己份内的工作。政府官员们用来为自己获得更大好处的办法,那就是在私底下出卖国家赋予自己的权利了。

如果各级政府官员们在上朝的时候只知道曲意逢迎国王,回家后就一心考虑个人的私利,这种情况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爵位和俸禄而已。那些在私底下把国家给予自己的权利当作商品出卖的官员,当然不是好官,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追求更多的钱财。因此,凡是希望能够获得升迁的政府官员都会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钱财去贿赂上级,就会有做大官的希望。”还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用钱财去贿赂上级就想升官,就好像是牵着猫去引诱老鼠一样,是毫无希望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想用自己的忠诚去对待上级,就想要升官,就好像是想要顺着已经断了的绳子爬上一棵弯树一样,更是没有希望的事情。既然没有钱去贿赂上级不可能升官,只靠对上级的忠诚也不可能升官,那么,我又怎么可能不到下面去骚扰老百姓、勒索钱财,以便贿赂上级,争取升官的机会呢?”老百姓们认为:“我每天都在努力地耕种,就是为了首先装满国家的粮仓,然后将剩余的粮食来供养父母;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了国家我拼命地奋勇作战,以便抬高政府的地位,保卫国家的安全。但结果却是国家的粮仓空虚了,政府的地位降低了,我自己家里也更加贫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如想办法去获得国家的官职了。”亲戚朋友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发现意见都很一致,于是就设法改变从事农业生产和战争的计划了。这样一来,那些在农业生产和战争中很杰出的人都努力去学习《诗》、《书》之类的东西,去努力和其他的国家接触,以便获得官职和爵位。那些比较渺小的人也都设法去经营商业、搞手工业,以避免从事辛苦的农业生产、避免参加危险的战争。如果老百姓都受着这种教育,国家的粮食怎么能不减少,军队的力量怎么能不变得薄弱呢?

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使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令都很明确,这样的话就用不着太多的智慧和计谋了;如果政府只要实行重视农业和战争这一个政策,国内的老百姓就不会变得懒惰,不会被花言所迷惑。因此,国家的力量就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只要国家的力量集中了,国家也就能够变得强盛了。如果政府喜欢那些善于花言巧语的人,它的国土就必然会被敌人侵占。换句话说,如果从事农业和战争的人有一千个,那些喜欢读《诗》《书》、讲智慧、搞辩论的人只要有一个,这一千个人也就会懒于去从事农业和战争了。如果从事农业和战争的人有一百个,搞手工业的人只要有一个,这一百个人也就会懒于去从事农业和战争了。一个国家只有依靠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战争能力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一个国家的国君也只有依靠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战争能力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老百姓不愿意从事农业和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国王只喜欢那些善于用花言巧语曲意逢迎他的人,是因为国家提拔、任用官吏的制度也偏离了正道。如果国家提拔、任用官吏的制度能够很

公正的话,治理国家也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如果实行只重视农业和战争的政策的话,国家就必然会越来越强盛。如果国家很富裕和强盛,国家的政务也能够处理得井井有条的话,这也就是成就帝王之业的道路了。因此说,成就帝王之业的道路并不是其他人能够营造的,关键就在于国王本身,就在于只实行重视农业和战争这一个政策。

现在的领导只是根据人们的才能和智慧的高低来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职和爵位,这样一来,聪明的部属就会观望领导的爱憎来决定自己的言行,在选拔、任用官吏,判断事情等方面都会刻意去迎合领导的心意。因此国家在选拔、任用各级官员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导致了国家的纷乱和政策的不统一,那些能言善辩的人往往会凌驾于法制之上。长期下去,老百姓努力的方向怎么会不越来越多呢?土地怎么会不荒芜呢?《诗》、《书》、礼、乐、善良、贤能、仁慈、廉洁、辩论、智慧,一个国家如果使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老百姓和处理政务的话,政府就没有办法让老百姓乐于从事农业耕作和为了国家而积极投入战争。政府如果采用这十个标准来治理国家,敌人来了,必然会战败,国土必定会被侵占;即使敌人暂时不来进攻,国家也必定会变得贫穷。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唾弃这十个标准,敌人就不敢来进攻我们,即使来了,也必定会被我们打败;如果政府兴兵去攻打别国,我们就必定能够取得那国的土地;如果政府不兴兵去攻打别国,国家也必定会富饶兴盛。一个国家如果喜好以实力作后盾去处理问题,就像是在用一种很难得到的东西进攻别国。一个知道如何用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国的国家,就必定会兴旺发达;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喜欢空谈的话,就像是在用一种很容易就能得到的东西去进攻别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前途一定是很危险的。因此说,圣人和英明的领导并不是对万事万物都能够知道得非常明白,他们也只是知道处理这些事情的纲要。所以他们治理一个国家,也只是注重考虑治国的纲要罢了。

现在,负责治理国家的官员们多半没有一个明确的纲要。他们在政府里议论起治理国家的方法的时候,往往只是在那里议论纷纷,每个人所做的,也只是在努力推翻别人的说法而已。因此国君往往被各种学说弄糊涂了,各级官员们的思想也被各种各样的说法弄得混乱了,老百姓们也因为懒惰而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了。所以国内的老百姓们都变得爱好辩论,喜欢钻研各种华而不实的学问,乐于从事商业经营,喜欢从事手工业,并以此来避免从事辛苦的农业生产和参加危险的战争。像这样下去,一个国家离亡国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一旦国家遇到困难,那些儒生就会憎恶给他们带来不方便的法律制度,商人们就会去投机取巧以获得利润,手工业者也不会愿意替国家出力以解救国家的危难,因此国家就很容易破败。由于农民少,而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哗众取宠的人又很多,所以国家也就会因为贫穷而面临很大的危险。就像是那些春天生长、秋天死去的、在田里吃光禾苗的虫子一样,这些害虫出现一次,老百姓就好几年都没有饭吃。如今,往往只有一个人辛苦地在农田里耕作,却有一百个人在旁边吃闲饭,这些吃闲饭的人,就是更大的害虫了。

像《诗》、《书》这样的东西,即使每个乡都有一捆、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卷,对于治理一个国家来说,依然是毫无益处的,因为这不是把国家从贫困转为富裕、将危险转为安全的方法。因此说,古代帝王将国家从贫困转为富裕、将危险转为安全的方法,关键就在于重视农业和战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平均有一百个人从事农业生产,才有一个人无所事事的话,这个国家必然就可以成就帝王之业。假如平均有十个人从事农业生产,才有一个人无所事事的话,这个国家也必定可以强盛。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半的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另一半人却在无所事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将是极为危险的。因此,作为一个国家的英明的领导人,总是希望老百姓能够积极地致力于农业生产。假如一个国家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在与其他诸侯竞争、抗衡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国家,这是因为老百姓的力量不够充足。所以其他的诸侯就可以乘着这个国家的软弱,而对他进行征服,趁着这个国家比较衰弱的时候,可以对他任意加以欺凌。如果到了一个国家的领土被侵夺,却没有办法振作的时候,就连后悔也来不及了。

圣人知道如何治理国家的纲要,所以设法使老百姓能够专心务农。只要老百姓能够专心务农,就会变得朴实而容易治理、忠厚而容易役使、诚信并且愿意为了国家的安全而投入保卫国家的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老百姓的力量发动对其他国家的战争了。只要老百姓的思想变得专一了,就很少会发生欺诈的事情,而且他们也能够安心地在原来的地方居住;只有老百姓的思想专一了,政府才可以用赏赐和刑罚来督促他们按照政府的设想去努力务农;只有老百姓的思想专一了,政府才有可能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的对外战略。

老百姓所以能够尊重、爱护自己的国家,并愿意为了政府的法令而作出牺牲,正是因为他们每天早晚都从事着辛苦的农业生产。老百姓所以没有办法被政府顺利地役使,正是因为他们看到善于巧言善辩的人可以陪伴在国君身边无所事事,却享受着很好的待遇,获得个人的尊贵;正是因为他们看到商人可以不劳动而赚钱发财;正是因为他们看到手工业者可以付出很少的劳动却可以养家糊口。老百姓如果看到这三种人既自由又可以获得很大的好处,他们就必定会想办法去避免参加辛苦的农业劳动,他们就不会安心地在原来的地方居住。只要老百姓不能够安心地在原来的地方居住,他们就必定不肯替国家保卫领土,就必然不愿意在国家遇到危险的时候积极地参加战争。所有治理国家的人总是忧虑老百姓散漫而且他们的意志不能集中,因此圣人就实行重视农业重视战争的政策,这就是为了把老百姓的意志集中起来。只要国家实行这个政策一年,整个国家就可以在十年内保持强盛;实行这个政策十年,就可以使整个国家在一百年内保持强盛;如果国家能够实行这个政策一百年,就可以使整个国家在一千年内保持强盛。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一千年内保持强盛,这也就是成就了帝王之业了。一个国家所以要实行明确的赏赐和刑罚制度,就是用来辅助重视农业和重视战争的政策的一种办法,目的是让老百姓明确地知道可以获得赏赐和可能招致惩罚的原因,这样的话,治理国家的政策也

就算是获得成功了。

一个成就了帝王之业的国君,必然知道治理国家的纲要,因此,不必依靠赏赐,老百姓也能够尊敬和爱戴自己的国君;不必依靠爵位和俸禄,老百姓也能够努力地工作;不必依靠刑罚,老百姓也能够乐于为了国家而死。到了国家面临危险、国君感到忧愁的时候,即使善于空谈的人能够排成队,对于解除国家的安全和危险也是毫无好处的。国家面临危险、国君感到忧愁的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国家的威胁。如果一个国家还不能征服强敌,攻破敌对的大国,就必须修理好守卫国家的军事设施,考察好防守的地形,并设法集中老百姓的力量,来应付外来的危险,然后才有可能消除面临的忧患,成就帝王之业。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重视修明政治,实行重视农业和战争的政策,并把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除掉,禁止在国家里搞那些浮华而无用的学问,不允许无所事事的人到处游荡,使老百姓专心于农业生产,这样的话,国家才可以富裕,老百姓的力量才有可能集中。

现在的国君都在担忧国家面临的危险和本国兵力的薄弱,然而,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却不断地听一些说客们的空谈。说客们往往多得能够排成队伍,但是这些人的繁琐的议论、华而不实的言辞,对解除国家面临的危险却没有一点实际的用处。国君们很喜欢这些说客的巧辩,却不注意研究这些言论的实际用处,在这种情况下,说客们很得意,甚至在路上都在进行着哗众取宠的辩论,一帮一帮地结伙成群地辩论。老百姓看见他们甚至都可以说服王公大臣,也就都去学习他们那些无用的东西了。这些说客们聚集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各种言论纷纷扰扰地散布。老百姓喜欢这样做,大官们也喜欢这样做,所以老百姓中专心务农的人就少了,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就多了。由于无所事事的人多了,农民们也就跟着变懒惰了。由于农民们变得懒惰了,许多土地就开始荒芜。由于儒生们造成的这种风俗,导致老百姓抛弃了辛苦的农业生产,去从事这种无谓的谈论,去说大话、说假话。老百姓都抛弃辛苦的农业劳动,整天无所事事,都凭借空泛的谈论来互相争雄。因此,老百姓就不再拥护自己的国家了,背叛国家的人多得成群。这就是使国家变得贫穷、兵力变得薄弱的教育!所以,政府在用人上如果都以谈吐的高度为标准,老百姓就不会再喜欢农业生产了。只有英明的君主才知道喜欢听人谈论的做法是不可能加强兵力、开疆拓土的。只有圣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才能够实行这样一个政策,也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力量集中在发展农业生产上。

开 塞

自从天与地形成之后,人就产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爱自己的亲人,就是要努力去追求个人的私利。由于只爱自己的亲人,就必须设法划分亲疏;要追求个人的私利,就会产生奸险的想法。由于老百姓人数众多,却都在设法划分亲疏,都存在

奸险的想法,整个社会就都乱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努力去战胜对方,都在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努力获取个人的私利;为了能够战胜对方,彼此之间就会发生战斗;为了能够获得个人的私利,彼此之间就会为此而争论;在彼此之间发生战斗和争论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公正的标准,人们就容易丧失理智,而使结局无法收拾。因此,就有贤人来创立了判断是非的公正的标准,并且劝导人们不要存有私心,这样一来,人们就喜好仁慈的人了。在这个时期,人们就抛弃了只爱亲人的思想,尊崇贤人的思想也就树立起来了。

一般说来,那些仁慈的人都是把爱护别人、使别人得到益处当作自己的职责,那些贤人都是把比其他人更加出类拔萃作为自己的追求。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人口众多,却没有一定的制度来治理这个社会,而人们总想着使自己能够出类拔萃,那么,这个社会也一定会陷入纷乱之中。因此圣人就出现了,他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划定了土地、财物、男女的分界。虽然分界已经划定,假如没有制度来保障它,也是不行的,因此就创制了法律。法律已经创制了,假如没有人来执行它,也是不行的,因此就设置了官吏。虽然官吏已经设置了,假如没有人来统一使用他们,也是不行的,因此就设立了国君。既然设立了国君,那么,人们就抛弃了尊重贤人的思想,而树立了尊重贵人的思想。

总而言之,上古时代,人们只爱自己的亲人,并且努力追求个人的私利;中古时代,人们尊重贤人,喜好仁慈;近古时代,人们尊重贵人,尊重官吏。尊重贤人是因为他们的才德超出了旁人;而设立国君却使贤人没有了用处。只爱亲人是走自私自利的道路;而判断是非的标准却使人们的私心没有办法实现。这三个时代不同,并不是人们做事彼此矛盾,而是因为人们所遵循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因而所重视的东西就有了改变;这是因为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所采取的治国办法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实现帝王之业的道路是有标准的。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国君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而臣民所走的道路是另一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但他们所遵循的标准却只有一个,就是要适应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老百姓比较愚昧的时候,有智慧的人就可以成为国君;在老百姓比较聪明的时候,拥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国君。这是因为,在老百姓愚昧的时候,他们拥有很多的力量,却没有智慧,因此,拥有智慧的人就可以统治他们;在老百姓普遍地拥有智慧以后,他们就拥有了很多技巧,但力量就不够了,因此,有力量的人就可以统治他们。作为人之常情,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想办法去学习;力量用光了,就不得不屈服了。所以说,神农氏由于教导老百姓进行耕种而称王天下,是因为老百姓学习了他的智慧;商汤、周武致力于壮大国家的力量,并用兵讨伐诸侯的时候,诸侯是因为不能与之抗衡而屈服于他们的力量。在老百姓愚昧的时候,因为没有智慧,他们就要向聪明的人请教;在老百姓拥有了智慧以后,他们就因为没有了力量而不得不屈服于别人的统治。所以说,一个依靠教会老百姓知识而成就帝王之业的人,就应该放弃使用刑罚;一

个依靠强大的力量征服了诸侯而成就帝王之业的人,就应该抛弃德教的说教。

作为圣人,在做事的时候,既不能够死板地效法古人的做法,也不能够拘泥于当代人的做法。如果死板地效法古人的做法,就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如果一味地拘泥于当代人的做法,在当前形势的限制下,就会四处碰壁。周朝的国君并没有仿效商朝的做法,夏朝的国君也没有仿效虞舜的做法。这三个朝代所面临的形势各不相同,但他们却都可以成就帝王之业,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找到适应时代需要的治国之道。另外,他们在创立帝王之业的时候用的是一套办法,而在维持帝王之业的时候,用的就是另外一套办法了。周武王是采用背叛商朝的手段来夺取政权的,成功以后,却提倡服从国君的领导;成功之前是在和商朝争夺天下,成功以后,却在国内教导人民要崇尚退让的美德。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依靠的是武力,而在维持政权的时候依靠的却是道义的力量。现在的时代,强国都在设法兼并其他的国家,弱小的国家都在努力自卫,以免被其他国家吞并。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和虞、夏的时候相提并论,也不能仿效商汤、周武时的道路;商汤、周武的治国方法,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凡是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没有不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的,凡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小国没有不进行自卫的。商汤、周武所推行的治理国家的政策,很久以来就已经行不通了,而当代的国君又没有人能够推行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政策,所以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明君就再也没有出现第四个。即便是有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治国之策,如果不是一个圣明的国君,他也是不会相信的。现在,我想要从政治效果上来说明我所坚持的新的治国之道。

在远古的时候,老百姓朴实而且忠厚,然而现在的老百姓却奸巧而且虚伪。因此,在古代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道德摆在第一位,来实行德治;在现代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刑罚摆在第一位,来实行法治。对这一点,一般的人是会感到很疑惑的。现在,人们所说的“义”,就是那种要建立老百姓所喜爱的东西,废除老百姓所憎恶的东西的行为;人们所说的“不义”,就是那种要建立老百姓所憎恶的东西,废除老百姓所喜爱的东西的行为。对于这两样,他们的名称和实质都是应该互换一下的,对它们,不能不加以仔细的考察。实际上是:建立老百姓所喜爱的东西,最终他们将会受害于他们所憎恶的东西;建立老百姓所憎恶的东西,最终他们将会享受到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从哪里能够知道这个道理呢?这是因为,如果老百姓知道忧愁,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就会进行深思熟虑,深思熟虑之后便会使自己的行动处处遵守法律的规定;如果老百姓总是很快乐,他们就会被一些花巧的东西所迷惑,受到这些东西的迷惑就会去追求安逸的生活。所以说,如果用刑罚来统治老百姓,老百姓才会害怕;只有老百姓感到害怕,才不会有奸邪的事情发生;只有没有奸邪的事情发生,老百姓才能最终享受到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如果用所谓的“义”来教导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变得放肆;一旦老百姓变得放肆,国家就要陷入混乱;如果国家混乱了,老百姓也就会受害于他们所憎恶的东西了。由此可见,我所说的“刑”才是“义”的根本所在。而世人所说的“义”却是通向残暴的道路。总而言之,在治理国家的